

英華

白寿彝
郭预衡

启功
李修生

主编

文史

散文卷



郭预衡 陈芳岚 编注

湖南出版社

文 史 英 华

白寿彝 启 功

主编

郭预衡 李修生

散 文 卷

郭预衡 陈芳岚 编注

●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资助项目

湖 南 出 版 社

〔湘〕新登字001号

责任编辑：曾大力
特约编辑：徐日晖

文史英华·散文卷

郭预衡 陈芳岚 编注

*

湖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 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93年12月第1版第1刷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3.625

字数：314,000 印数：1——5,000

ISBN7—5438—0642—8

K·114 定价：13.10 元

题 记

本书是文史名著的选本，按着不同的体例，区分为群经、诸子、纪传、编年、典志、学案、史论、散文、辞赋、诗、词、散曲、戏曲、小说、文论等十五类，每类自为一册，共十五册。在旧日的四部分类法中，经和子是在史部集部之外，各为一类。本书是把这两类作为史书的特殊形式来处理的，所以全书的标名也就以文史二字来概括了。

选本的工作起源甚早。据旧史相传，孔子是第一个选本专家。所谓“删诗书”，就是他的选本成果。后来梁萧统的《文选》，宋李昉的《文苑英华》，都是选本的大宗。清人的《古文渊鉴》、《古文辞类纂》、《经史百家杂钞》，也都是著名的选本。近数十年来，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古文释义》、《古文嗜凤》等书，因篇幅不多，便于诵习，流传较广。这些选本都各有其历史的背景和编撰上的特点。本书面向目前读书界的具体情况，是为大学生、中学教师及一般干部在文史著作方面提供的适当读物，希望做到既博又精。所谓博，是指上下两三千年文史各体具备。所谓精，是指所选作品，文、情、道、义必有所当，读者既可以通过对本书的泛览得窥我国文史名著的大概，也可以随其所好反复诵读，不断提高其辨析古人著作的水平。本书当有不少错误和缺点，欢迎读者指正。

本书的编选，在1982年已开始酝酿。1985年，启功同志、郭

预衡同志和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同志们共同作出了规划，并着手进行。因人力的不足和出版单位的不能确定，工作开展不甚顺利。1987年以后，李修生同志承担起全部的组织工作，工作进度在逐步加快，以至于全书完成。湖南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大力的支持，劳柏林、易孟醇、胡昭镭、徐日晖、曾大力等五位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，我们在此表示感谢。

白寿彝

1992. 4. 10

前 言

中国古代散文，也如诗歌，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，涌现了许多精美的作品。从先秦开始，直到晚清，每个时期的散文，都有其时代的特色。这个散文选本，作为《文史英华》的卷帙之一，注意选入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散文英华，并且力图选入能体现时代特点的散文。

但历代散文浩如烟海，只见一斑，难窥全貌。为了使读者有个总体的认识，这里拟对各个时期散文的特点作个简要的介绍，并对散文发展的历史作些概括的说明。

从殷商开始，中国散文有了相当完整的形态，其特点是发言直率，用语质朴，不尚雕饰，而粗具文采，有所形容，而并非刻意。例如《盘庚》三篇，记载盘庚迁都的告谕，其中有“先王有服，恪谨天命”，“勉出乃力，听予一人之作猷”云云，话是说得相当直率的，用先王和天命作为发号施令的依据，反映了殷人敬事天地鬼神的思想特点。从艺术形式看，行文虽然旨在说理，用语却已颇具形象。引譬设喻，粗具先秦散文的艺术特征。例如说：“若颠木之有由蘖”，“若网在纲”，“若农夫服田力穡”，“若火之燎于原”，“若射之有志”，等等，都不仅是抽象地说理，而颇富于形象性。

当然，这些文章写定之时，已在西周或更晚的春秋战国之世。在流传的过程中，不免有所加工和润色，未必仍是本来的面目；但从文章总的内容和形式看，仍然不失殷商文章粗率质直的特点，与后人的拟古之作如《虞书》的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，或《夏书》的

《甘誓》，以及《商书》的《汤誓》、《汤诰》等等有所不同。

到了西周，散文的特点有了变化。《尚书》里的几篇《周书》已与《商书》的《盘庚》显然不同。以周公告诫成王的《无逸》而论，内容虽然也讲“天命”，也称“先王”，但更多的是讲人事，讲“保民”多于“敬天”，特别是讲到以殷为鉴，已经重视历史经验。例如说：“君子所其无逸，先知稼穡之艰难”，“继自今嗣王，则其无淫于观，于逸，于游，于田”，“无若殷王受之迷乱，酗于酒德哉！”如此等等，多用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教。这是西周的几篇诰命之文的主要特点。这样的思想内容，已与殷商之文有所不同。由于旨在说教，吐辞用语，也有新的特征：语气比较平和，吐辞比较委婉；引证历史故事，亦多娓娓可听。孔子曾用“郁郁乎文哉”称赞周之文化，就散文而言，也有这个特点。

到了春秋之世，文章的特点又有变化。这时礼坏乐崩，王纲解纽，私人可以讲学，处士可以横议。于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说理之文和史传之文。《周易》一书，“人更三代，世历三古”，但写定之时，亦在晚期。其中《易传》之作，虽未必出自孔子，但成文之日，可能已是春秋之末或战国之初。例如其中的《系辞》，从内容到形式，都有春秋战国的文风特点。其中讲到天地变化、人事吉凶，有这样的话：

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；卑高以陈，贵贱位矣；动静有常，刚柔断矣；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吉凶生矣；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变化见矣。

这样的文章，是殷商、西周所不曾有的。

《系辞》不仅讲历史经验，而且讲处世哲学，例如说：

子曰：危者，安其位者也。亡者，保其存者也。乱者，有其治者也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乱。

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

这里从安危治乱，讲到安身保国。有经验谈，有辩证法，是人生哲学，也是处世之道；是人事，也是政治。

《系辞》是《易传》诸篇的代表，代表着这个时期哲理之文的新特征。

《系辞》之外，《文言》一篇也是一向为人称道的作品。清人阮元在《书昭明太子〈文选序〉后》一文中说：“孔子《文言》，实为万世文章之祖。”他特别称道其中“奇偶相生，音韵相和”的艺术特征。阮元将《易传》之文仍然视为孔子所作，自是未脱传统之见，但他发现“奇偶相生”这些特点，则是看出了这类文章的时代特征的。

当春秋战国之际，各体文章，韵散不分，骈散不分。当时的诗歌可以无韵，而散文却可用韵。这种体式，颇与后代不同。

代表这个时期文章特点的，还有《论语》、《国语》和《左传》。

《论语》一书，乃孔门师徒的对话之文。这个形式也是新体。师徒之间坐而论道，与《尚书》中君臣之间咨询政事不同。其内容之广阔，形式之自由，开了后代讲学之文的先河。其中只言片语，往往包含深邃的哲理。例如《子罕》篇：“子在川上曰：‘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’”又云：“子曰：‘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。’”语虽简短，而意味深长。另外，还有一些时事短评、文艺短论，也都写得精炼简要。还有一些论学之言，语重心长，发人深省。《先进》篇的《侍坐》一章，不仅是坐而论道，而且是专题论政。这样的文章也是前此诸书所不曾有的。

《国语》和《左传》代表这个时期的史传之文。二书相传都是左丘明所著，其实都是托名。这样的著作，既非成于一时，也非

出自一手。二书内容有相同之处，文风也有近似之处，但《国语》偏重讲述片段的史实，旨在说教；而《左传》则在编述系统的史事，偏重纪实。例如《国语·鲁语上》中“晋人杀厉公”一段，讲到国君被杀，咎由自取，过在厉公，不在晋人。这同《周语上》的“厉王虐”一段文章的命意相似，都是从历史故事中引出教训。由于旨在说教，所以行文也就婉而多讽。

《左传》记事又侧重于记载行人的言论和战争的过程。记言记事都比《国语》更为完密、生动。从思想内容看，《左传》在讲天、神、君、民的关系方面，和《国语》相似，且比《国语》更倾向民意。例如《左传》襄公三十三年写子产不毁乡校，重视舆论，尊重民意，与《国语》中“邵公谏弭谤”的话大体一致。桓公三年还有“夫民，神之主也”的话，以民为主，比《国语》更为明确。

《左传》记事之工，可以隐公元年所记“郑伯克段于鄢”一篇文字为例。在这篇记事中，以极简炼的笔墨，记述了纷繁的事件，刻画了众多的人物，层次之分明，语言之精炼，结构之严密，都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的。

《左传》记言之美，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。所载行人的辞令，委婉曲折，极有特征。例如写子产于襄公二十五年伐陈而献捷于晋，晋人之问，子产之答，最后竟使晋卿士庄伯无话可说。孔子为此曾发表评论说：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。晋为伯，郑入陈，非文辞不为功。”言而有文，可以说是《左传》记言的一大特征。唐刘知幾《史通·申左》说：“左氏载诸大夫辞令，行人应答，其文典而美，其语博而奥。”又在《载言》篇说：《左传》之文，能使读者“寻绎不倦，览讽忘疲。”

时至战国，文章的变化更大。清人章学诚说：“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，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，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。故论

文于战国，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。”又说：“后世之文，其体皆备于战国。”（《文史通义·诗教上》）章氏所谓后世之文体皆备于战国，虽不尽确当，但战国之时，社会有更大的变革，文章有更大的变化，战国之文，承前启后，对后代有更大影响，则是事实。

这时文章之所以有大发展，主要原因是诸子驰说，百家争鸣，著书立说，都放言无惮。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儒、墨、道、法和纵横家。

儒家之文，在战国时期，主要著作是《孟子》和《荀子》。孟轲和荀卿都是孔门后学。孟轲道性善，而荀卿讲性恶；孟轲称先王，而荀卿法后王。《孟子》之文，引譬设喻，纵横博辩；《荀子》之文，立论驳论，章法谨严。孟子发展了孔门的仁政思想，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主张，这在“孟子见梁襄王”一则文章里便有所体现。他对于梁襄王这样的诸侯之王，竟谓“望之不如人君”，他在王公面前，能够无所畏惧，如此放肆，形于文章，也就气势充沛。

荀卿虽亦出自孔门后学，但他的思想却突破了儒家的某些观念。尤其在天人关系方面，他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。《天论》一篇就与儒家的传统思想不同。他的文章，吐辞用语也更为精密。《劝学》一篇，引物连类，反复论证，颇有学者之文的特征。

墨家之文的代表著作是《墨子》。墨家主张兼爱、非攻、尚贤、尚同、节用、节葬、非乐、非命、天志、明鬼。十大主张，都有现实的针对性。对于墨家的这种思想，孟轲攻击不遗余力，指为“无父无君”。荀卿也认为墨子“蔽于用而不知文”。但庄子则以为墨子“其生也勤，其死也薄”，“日夜不休，以自苦为极”，乃天下之“才士”。从《兼爱》、《非攻》、《节用》、《节葬》以及《非乐》等篇看来，墨子对于王公大人之责难，多半是从万民百姓之利出

发的。这在诸子百家中，是很突出的。但墨家过于尚质而不重文，因此，发而为文，虽讲“三表”之法，逻辑严谨，却缺乏文采，与儒者之尚文有所不同。

道家之文的代表著作是《老子》和《庄子》。老聃其人的生活时代也许早于战国，但其书之成，已在春秋战国之际。老聃、庄周，都讲无为，但老子旨在无为而无不为之；庄子则归于一切不为。二者的思想和文风有同有异。“时有愤辞”，为二书所同。而《庄子》文章之汪洋恣肆，不但超过《老子》，而且超过晚周诸子。《齐物论》中几段文字，形象之生动，设想之奇瑰，皆非诸子百家之文所能及。其涉世之文，如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，诸侯之门，而仁义存焉”云云，也比《老子》的“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”云云更为深刻痛快。

后代与《庄子》并称的著作还有《列子》。此书或谓晋人伪托。然书中实有先秦的原始文字，其中有些寓言故事如“杞人忧天”之类，都非后人所能伪造，文章也瑰丽不凡，很有文采。

法家的代表著作是《韩非子》。韩非著书，已是战国晚期。韩非文章的思想特点也很突出，一是崭新的历史观点，一是全面的法治理论。其《五蠹》一篇，就是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出发，论证刑赏之必要的。他说远古的天子享受甚薄，故肯于辞位；而当今的县令享受极厚，故不肯去职。从物质实利立论，不用道德观念说教，这是早期地主阶级思想家坦率真实的文字。这样的文章是很有时代特点的。

最能代表战国时代特点的文章，还有《战国策》。此书一般视为历史著作，谓之史传之文。其实，从其思想倾向观察，实为纵横家言。书中记录了大量的纵横家的言论和活动，当然也包括了战国时期各国纷争的历史。纵横家是这个时期最活跃的政治风云

人物，其观念更明显地突破了传统的儒家思想，文章也比各家各派更加放言无惮。宋人李文叔《书〈战国策〉后》说：“《战国策》所载，大抵皆纵横捭阖譎诌相轻倾夺之说也。其事浅陋不足道，然而人读之，则必向其说之美而忘其事之陋者，文辞之胜移之而已。”“文辞之胜”，确是《战国策》文章的一大特点。

当然，《战国策》一书的内容又是驳杂的。其中也不尽是纵横家言，例如《颜觸论贵士》一篇，就包含了道家思想。这篇文章的风格也和苏秦张仪等人的游说之辞有所不同。

战国晚期，九流十家之中，还有杂家一派，其代表著作是《吕氏春秋》。此书特点是“合儒墨，兼名法”，不名一家之学，反映了战国后期各家各派互相融合的一种倾向。此书的结构比前此诸书更成体系，文章也写得比较平实。《去私》一篇，对于现实政治有所批判，行文也敢于放言。虽在秦相吕不韦指令之下产生的著述，却仍有战国时期的文风特点。

秦并六国，天下一统，时代发生了大的变动。始皇焚诗书，坑术士，推行了一系列的文化专制的政策，这对文章的影响甚大。《文心雕龙·诂赋》说：“秦世不文”，这同当时的政策颇有关系。终秦之世，号为作者的，只有丞相李斯。李斯的传统名篇《谏逐客书》写于秦并天下之前，文章还比较畅所欲言，仍有战国之文的特点。在这以后，他又写过几篇刻石之文，都是颂德纪功，和前代之文便迥然不同了。

楚汉之际，杂学复兴，游学之士，多慕纵横；汉初法网，又比较疏阔，于是汉初之文，又延续了若干战国的余风。贾谊的《过秦论》，晁错的《言兵事书》，出谋献策，虽已不同于战国的策士之辞，而驰骋辞辩，仍似受管、商、纵横的影响。

但到了武帝之世，情况又不同了。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学

风变化，文风亦变。从董仲舒开始，改变了战国的余风。但司马迁生当武帝之世，所著《史记》，却仍然具有先秦的文风特点。这是因为司马迁看到了许多历史上的不公，多所愤慨，故发而为文。鲁迅称《史记》是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，就指出了这个特点。还有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一文，也写得激昂慷慨，愤愤不平。

在司马迁以后，汉代文章，可以说一代不如一代，经生博士之文，几乎无足道者。不过在西汉统治的几百年间，贾谊、司马迁等作者之外，也还有一些作者写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文章。例如早期的东方朔，所写《答客难》一文，便很有特色。到了东汉，王充的《论衡》，更是出类拔萃，大不同于经生、儒者的文章。还有仲长统的《昌言》，对于汉末的现实，多所批判，《理乱》一文，颇有新的时代特点。

这时反映世风、士风的文章，还有马援的《诫兄子严敦书》一类作品。由于汉代后期法令滋繁，豪侠之士，不免犯禁。故此时此际，颇多“诫子”、“教子”之文。这类文章也是具有时代特征的。

汉魏之际，天下大乱，作为汉代统治思想的儒术开始动摇；名法思想、宗教思想开始流行。这对文章又有很大影响。加以这时曹操当权，网罗文士，他下过几篇“求贤”的命令，公然倡言“唯才是举”。这是汉人文章里所不曾有的。他自己能写文章，又网罗了许多文人学者，在他的影响之下，文章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所以鲁迅称他是“改造文章的祖师”。

与曹操同时，还有孔融，文章也是写得很有新的特点的。他写的《难曹公表制酒禁书》等，胆大气盛，无所忌憚。他另有《论称衡书》和《论盛孝章书》，也写得“气扬采飞”。（《文心雕

龙·章表》)“气扬采飞”，可以说是孔融文章的一大特点。

孔融是“建安七子”之一，其他诸子之文，也都写得比较通脱、随便。但孔融虽在“七子”之列，而年辈较长，其行文之以气胜，又非其他诸子所及。

到了魏晋之际，文章的代表作者有阮籍和嵇康。《文心雕龙》称此二人“师心以遣论，使气以命诗”。当时司马氏当权，提倡儒学，宣扬礼教，嵇、阮二人都反对这种伪学。嵇康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一文，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，是触犯了当代的统治思想的。他还有另几篇作品如《管蔡论》等，都是鲁迅所谓“思想新颖”的文章。

到了两晋，文风与魏晋之际又有不同。这时的诗文作者号称三张、二陆、两潘、一左，但就散文而言，更值得称道的作者是王羲之。此人文名一向为书名所掩，其实他的文章是很有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的。他的名篇《兰亭集序》，虽为宴集而作，但不同于寻常的应酬文字，写得极有情致。其中说到“一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殤为妄作”，颇与刘琨的《答卢谡书》所谓“聃周之为虚诞，嗣宗之为妄作”同调。文章表面平淡，而内心并不平和。如果联系到他的《诫谢万书》、《誓墓文》诸作，对于这篇文章更可获得深入一层的理解。

到了晋宋之际，文章的代表作者是陶渊明。他的文章表面看去更加平淡。《五柳先生传》自叙生平，真似忘怀得失、遗落世事者。此外，《归去来辞》、《桃花源记》等，也都有这个特点。但是，在他另外的一些诗文里，也有愤激和不平。“平淡”，只是他的文风的一个方面。

到了南朝，改朝换代比过去频繁，士人的思想观念变化很大。三教并行，人无特操。在宋、齐、梁、陈几代，出现了几个“文

雅的庸主”和一批“柔媚的词臣”。这时的文章变化也大。“俚采百字之偶，争价一句之奇”，“文多拘忌，伤其真美”。但在这个时期，也产生了几个很有特色的作者，写了一些很有代表性的文章。

早期的鲍照，以诗见称，但他的散文也很突出。他的一篇《请假启》和另一篇《瓜步山楬文》，篇章甚小，而蕴意甚深。对于当时的世态人情，揭露得相当别致。孔稚圭的《北山移文》，丘迟的《与陈伯之书》，都是传统的名篇，可以看作当时的骈体文章的代表作品。而庾信的《哀江南赋序》则更是集南朝骈文之大成者。

齐梁时期，还产生了一些书札小品，如陶弘景的《答谢中书书》，吴均的《与宋元思书》，都写得清新秀丽，模山范水，前此罕见。

这个时期，在众多的“无特操”的作者中，也有坚持特操的，如范缜之撰《神灭论》，就是一篇很有影响的名作。

这时的北朝之文，又与南朝不同。如郦道元撰《水经注》，杨衒之撰《洛阳伽蓝记》，行文虽受南朝的影响，但叙事重视征实，则是北方文风的特点。

颜之推由南入北，所撰《颜氏家训》，也是独具特色的著作，作者自称他的“家世文章”与梁世的时文有所不同。

到了隋唐，天下又归一统。下逮两宋，发生了文学史上所谓的“古文运动”。几百年间，文章又有新的演变。

唐代初年，政治比较开明，虽然天下一统，而太宗为政，却不同于秦皇汉武，没有实行文化专制，而是以隋为鉴，求言纳谏，广开才路，广开言路。这对一代文章的发展，影响不小。

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，首先产生了许多谏疏之文。魏征等人的谏疏，如《谏太宗十思疏》等，能够知无不言，披肝沥胆，在

历代的政论文章里是独具特色的。

但是，唐朝的统治，也如历朝历代，开国之君，比较开明，而继世之主，便走向反面。到了高宗之时，就不再求言纳谏了。在这个时期，便产生了王勃等初唐“四杰”之文。这几个人的文章特点，形式上继承了南朝的骈体，内容则多是怀才不遇的牢骚。骆宾王之写《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》，和他个人怀才不遇很有关系。这些作者在唐初开明政治的启迪之后，往往幻想建功立业，而一旦失意，便不免满腹牢骚。王勃的《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》之所以感叹“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”，不是无缘无故的。

到了天宝年间，唐朝的统治逐渐衰微，安史之乱前后，文章又有变化。这时的许多作者，目击时艰，写出了许多忧时念乱之文。这类文章的代表作者是元结。此人虽然不曾倡言“古文”，却是“古文运动”的先行者。

到了贞元以后，朝政日益腐败。一些文人学者，大都不满现实，希望有所变革。这时韩愈写了许多文章，大讲广开才路，《毛颖传》一文，表面看来，似是游戏笔墨，其实是讽谕人才不尽其用。这样的文章，和他的《原毁》、《进学解》等，一脉相承。柳宗元是“永贞革新”的直接参加者，志在解救生民，为文尤有时代特点。他的《永州八记》，貌似模山范水，实为骚体之文。与韩、柳同时的很多作者，如李翱、刘禹锡等，也都写了一些很有时代特色的文章。直到此后的孙樵、杜牧，仍受此风影响。为世所称的“古文运动”，实际上是和当时的朝政改革相辅而行的。

到了晚唐，朝政改革彻底失败。藩镇跋扈，宦官擅权，在黄巢起义前后，文章又有变化。这时“诗风衰落，而小品放了光辉”（鲁迅：《小品文的危机》）。

皮日休、陆龟蒙、罗隐等人的杂文小品是这个时期的最有时

代特色的文章。鲁迅说：“罗隐的《谗书》，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；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，别人也称之为隐士，而看他们在《皮子文藪》和《笠泽丛书》中的小品文，并没有忘记天下，正是一榻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铓。”（同上）皮日休后来是参加了黄巢起义的。这也恰是他“并没有忘记天下”的证明。

经过五代十国之乱，到了宋初，统治者亦甚开明，从太祖开始，广开才路，广开言路，比唐代又进一步。因此，有宋一代，涌现了更多的关心现实、志在改革的人物，其中多半也都是“古文运动”中的作者。从王禹偁开始，为文指摘官多吏冗，切中时弊。范仲淹执政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，为人作文，都为世人崇仰。欧阳修主盟文坛，选拔苏轼父子等众多作者，对于一代文章的发展，起了更大的作用。欧阳修的文章，平易自然，明白晓畅，形成了北宋之文的典型的文风，对此后几代都有影响。在欧阳修以后，最有成就和影响的作者是苏轼。苏轼之文，如行云流水，得之自然，自谓“如万斛源泉，不择地而出”，达到了挥洒自如的极高的境界。他和欧阳修一起，代表了北宋文章的最高成就。

到了南宋，许多文人学者，面临国破家亡的境遇，于是更多地干预朝政，论政之文，蔚然而兴。早期的李纲、宗泽和胡铨，晚期的辛弃疾、陈亮等，都写了出色的论政文章。诗人陆游、理学家朱熹等也都有论政之作。

到南宋末，抗战救亡，又有文天祥、谢翱等作者，写出了悲壮慷慨之作。还有宋元之际的邓牧，所撰《君道》、《吏道》，上继魏晋文章的思想传统，与唐宋古文的传统不同，又有新的特征。

金元之文，上承唐宋。元时王恽称赞金之刘祁有云：“道从伊洛传心事，文擅韩欧振古风。”道出了这两代文章的共同特征，即：思想接受宋代程朱理学的影响，而文辞则接受韩愈、欧阳修的影